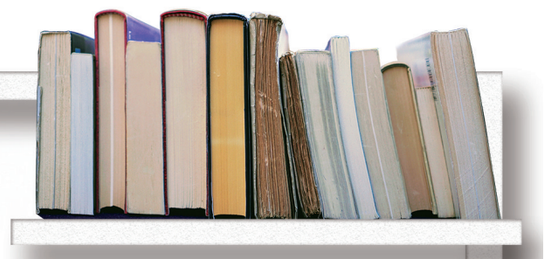
期刊·观察



中国动画迎来高光时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突破影史纪录的热度尚在，8月暑期档又有多部中国动画“出圈”，中国动画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有数据为证：《哪吒之魔童闹海》创下154.45亿元的累计票房，总观影人次3.24亿，上映至今共打破113项纪录。主要成就包括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全球影史票房榜第5位。暑期档上映的《罗小黑战记2》，豆瓣评分8.7分，问鼎国产院线新片的口碑之冠；《浪浪山小妖怪》打破了《大鱼海棠》保持近十年的纪录，登顶中国影史国产2D动画票房冠军；不过今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动画并不是这几部，而是8月刚完结、拿下豆瓣评分8.9分的科幻动画片《灵笼 第二季》。

世界动漫史曾刮过两次强劲的“中国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动画的第一次高潮出现：水墨片《小蝌蚪找妈妈》、木偶片《孔雀公主》、剪纸片《金色的海螺》等动画片的面世，让世人眼前一亮，这是国内动画片风格样式实现突破的一个阶段；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阿凡提》《骄傲的将军》《九色鹿》《猴子捞月》等动画作品相继在国际上获得殊荣，中国动画走出国门，让世界震惊。此外，《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动画系列片，也受到了广大少年的欢迎和市场的认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为以上诸多动画作品的主要制作方，一度被视为“中国动画学派”重镇。然而，日本、美国的动画片以“加工片”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后，让中国动画经历了一次人才大流失，中国动画一度走向低谷。但随着近年来《大圣归来》《魁拔》《大鱼海棠》《哪吒》系列等国产动画片叫好又叫座的表现，国产动画正在“收复失地”，继而在今年的暑期档“站上高峰”。

口碑之作的《罗小黑战记2》《灵笼 第二季》无疑都是国产动画的续集，且都是原创IP，反映了国产原创IP动画的进化。约6年前，《哪吒之魔童降世》和《罗小黑战记》先后上映。“罗小黑”这一全新的小众IP,其清新治愈的画风、高水平的制作仍让它广受好评。《南风窗》认为，“哪吒”和“罗小黑”共同扛起了国产动画未来的希望：前者代表着成熟的3D制作，后者则是“国产二维动画的巅峰”。杂志认为，《罗小黑战记2》不端架子、不整花活，用心铺开一个通俗又有回味的故事，既保留了合家欢定位，又在动作戏演出、叙事格局上进行了拔高，“‘罗小黑’系列真挚淳朴的情感表达，却仿若盛夏树丛间摇曳的光斑，能唤起观众久违的共鸣”。《灵笼》系列自2019年开播起，便彰显了其在国产动画中的稀缺性——一部优秀的硬科幻原创IP动画。硬科幻的迷人之处在于从充满想象力的基础设定出发，建立一个让人觉得既新奇又可信的世界。要做好这点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设定，从衣食住行到社会的组织结构都要考虑到，才能让整个世界鲜活且自洽。为此，《灵笼》制作组邀请了许多科学家担任顾问，写了上百万字的设定和剧本，最终构建了一个宏大而翔实的末世世界。随着《灵笼 第二季》在暑期开播，动画带给观众最直观的冲击就是世界观的升级。《三联生活周刊》评价说，科幻作品是一个非常适合文化输出的题材，因为优秀科幻作品的主角是“世界”本身，而文化就是承载世界观的各色事物，当观众被作品中的“世界”所吸引时，自然也会对这个世界中的文化感兴趣。

暑期档最出圈国产动画《浪浪山小妖怪》，和“中国动画学派”重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相关。两年多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原创动画短片合集《中国奇谭》在网上热播，《中国奇谭》由八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组成，赋予了中国动漫新的面目和可能性。《中国奇谭》八个短片中，其中最有观众缘的当属《小妖怪的夏天》，该片在粉丝的呼声中延展成为名叫《浪浪山小妖怪》的一部电影。电影讲述了主角小猪妖拉上蛤蟆精、黄鼠狼和猩猩怪，四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假取经队伍，想到西天取经成佛求长生不老的故事。两小时的故事里不仅仅有一座虚构的浪浪山、丑萌丑萌的小妖怪和一次荒诞又热血的冒险，还有很多人命运的答案。《新周刊》说，该片的特别之处，是在“正统”的唐僧师徒之外，讲一个新的取经故事。

以上动画电影有个相通之处：对具有世界属性和中国特性的故事，进行现代语境的解读和现代审美的表达，彰显了一个多元、包容、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

■文学期刊

藏书的独特意义

《上海文学》2025年8月刊，月刊

最新一期《上海文学》期刊“作家讲坛”栏目，刊发作家、批评家和诗人宋明炜关于藏书家的文章，讨论藏书家是否行将绝迹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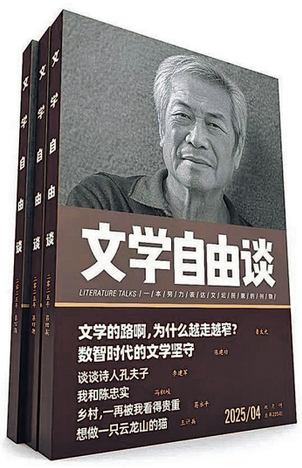
在书籍作为主要知识载体的年代，藏书无疑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历来受到读书人的重视。在我国古代悠久的藏书史上，读书人往往也是藏书人，“藏书”“读书”和“治学”之间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但随着知识、信息的载体从机械复制时代，经过数码复制时代、数码生成时代，发展到当下的短视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藏书，一个电子储存卡几乎可以存储所有的电子书籍，不仅节约、经济，而且无须搬运；纸质书成为需要大力呼吁提倡的事。

作者意识到，再过两代人，纸质书也许会成为一种古物，但藏书、读书的乐趣依然难以被取代：“每一本书都有属于特定时间、地点、心情的气息，打开来就找回一段记忆。打开自己的藏书，正是打开自己的记忆，藏书看似混乱无序，却是人生或人间情景的呈现。”实则，打开藏书不仅是在打开藏书家自己的记忆，大而言之甚至是在打开整个人类文明的记忆；藏书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人生或人间情景的呈现。

时代的巨轮势不可挡。作者认为，在虚拟数字网络重新定义书籍之前，那些曾经读过的书一定会在虚空浩渺的黑暗中熠熠闪光；书依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时间位置上的体验。

论述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与艺术质量

《文学自由谈》2025年8月号，月刊



在文学创作与评价体系中，长篇小说因其篇幅宏大和内容丰盈，往往被视为作家创作能力的试金石。数据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一个井喷阶段，每年逾万部长篇小说被创作出来，这些作品要么是大型文学期刊重点刊发的对象，要么是某些出版社倾力打造的精品工程，要么是网络文学平台强势推送的原创作品，它们被汇集到大小书店的新书柜台和各类网络平台上。最新一期《文学自由谈》杂志刊发评论文章，论述长篇小说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

文章开篇明义：长期以来，关于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与艺术质量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一方面的意见是，长篇小说的数量应当减少：近年国内外很多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网络流量时代，各类知识和海量资讯仿若湍急河流，吞噬了人们的文学欲望。尤其是在快捷高效的现代社会里，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大部分社会成员难以拥有奢侈的闲暇时间，无法在繁忙劳作之余安静从容地阅读长篇小说，因而长篇小说出版数量理应逐步萎缩。另一方面的意见是，年产上万部长篇小说，就一个读者来说，肯定是读不胜读的，但从满足不同方面精神需求的角度讲，读者无疑增加了选择空间。长篇小说数量的丰富，使得各个层面的读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读物，这未尝不是好事。

那么，长篇小说产出与大众文化消费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作者认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具备深刻的思想性、严谨的逻辑性与独特的艺术性。

文章写道，长篇小说创作有其自身法度与规律，要求作家更为敬业更加投入，付出更多精力和心血，作家必须在写作素材、想象力、艺术修养、文学素养等众多方面进行长期不懈地打磨与积累——这也是长篇小说迈向文学顶峰的基本保证。而一部内容和形式立得住的长篇小说，经过读者的检验，不仅能够传得开而且能留得下，成为一部具有普遍性意义、长久性价值的传世作品。这种传世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与长篇小说数量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读书期刊

新解三星堆青铜人面像

《读书》2025年8月号，月刊

“沉睡数千年，再醒惊天下”。三星堆的青铜人面像自出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造型吸引了专业学者和普通民众的目光。三星堆的青铜人面到底像谁，这是许多人的疑问，以至于有人将之作为三星堆与天外来客相关的主要依据。最新一期《读书》期刊刊发文章，对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解读。

作者在文中首先表明观点：人们费尽心思揣摩的人面像并非真实的人脸，只是覆盖在头像上的面具。三星堆所见面具形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较为常见的普通面具，另一类是造型更为夸张的纵目面具。纵目面具的基本形态与普通面具保持一致，但五官形态不同。最突出的特点是眼睛中部有柱状的凸起。学者通常认为，纵目面具代表三星堆信仰体系中“神”的形象，在祭祀礼仪中接受敬拜；其他普通面具则代表人间群体，是敬拜神灵的主体。文章写道，无论是“神”还是“人”的形象，均以面具的形式表现；三星堆先民塑造青铜人头像时奉行了写实的原则，因此面具的边界和结构十分清晰，梳理三星堆的各类面具，可以发现其表现出极强的佩戴属性。三星堆人头像上斜竖的巨眼，夸张的面部褶皱，平直的口部与下颌，显然是艺术化的造型，并非写实面目。三星堆先民对于佩戴“假面”的狂热，映射的当是某种未知的信仰追求。

如果说，面具之上的“假面”代表了三星堆先民信仰体系中的某种特定符号。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面具之下三星堆先民真实的面貌特征是怎样的？作者考察三星堆出土的扭头跪坐人像，视其为先民的真实人像：“国字脸，脸部较宽，颧骨突出。剑眉，眉头紧蹙。杏仁眼，眼窝内凹，眼睑清晰可见，眼珠微凸。鼻梁高挺，鼻翼突出。双唇微抿，嘴较宽，嘴角向下微撇。下巴方正。”除了青铜人头像外，三星堆还出土过少量的石质和陶质人像，并无佩戴面具，应是真实面孔。其功能也不一而足，有的石像似为低等级人群，与青铜人头像代表的身份差异极大。但不论如何，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写实人脸，显然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面孔。基于此，围绕三星堆的诸多言论如天外来客、域外起源等，在三星堆的“真实的面孔”面前毫无立论根基。

顾立雅其人其书

《书城》2025年8月号，月刊

1930年前后，一群美国年轻人聚集在北京，他们或是美国政府委派的外交文职官员，或是哈佛燕京学社等资助的学者学生，或是美国报社派驻的记者，他们虽职业身份有异，从事领域不一，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了解中国。顾立雅（1905年—1994年）正是这群人中的一个。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对顾立雅及其代表作《中国之诞生》中译本予以了介绍。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专注于中国上古史、古文字学及早期思想文化研究。1932年，27岁的顾立雅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来到北京留学。与很多到中国后才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同，他在留学之前就打下了中文基础：1928年前后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向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陈澧孙子陈受颐学习中文；1930年又到哈佛大学跟随中国学者梅光迪学习，在两年中大量阅读中国文献。到北京后，顾立雅在梅光迪等人的介绍下，很快融入了中国学术圈。

出于个人研究兴趣，以及私人藏家和古董商的影响，顾立雅收藏了一批甲骨、青铜器和雕件。这些都成为顾立雅写作《中国之诞生》时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书中写下观察时的情形，并将遗址、文物和考古人员的观点引为论据，使之成为当时最早一部向世界系统讲述商周考古成果的著作。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每当我提到一份甲骨文或青铜器铭文时，原件的复制品都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引用中文书籍时，我会查阅现存的中文善本。平均下来，这本书的每一页背后都包含着约二十五个我笔记中的单独条目，在写作时我都会查阅它们。”可以说，正是上述训练和经历，帮助顾立雅打下了研究中国古文字、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坚实基础，并在当时中外古史研究潮流的影响下，建立起了关于早期中国的观念。

《中国之诞生》一书于1936年出版，对西方汉学家和大众读者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响。此书分为上编“最新发现”、中编“商代”、下编“周代”，共二十八章。上编主要讲甲骨文的发现、殷墟考古和新旧石器的考古成果；中编结合出土文物和考古遗址，论述商代的都城、生活状况、手工制品、青铜器、社会与国家制度、战争、文字、神祇、卜筮、祭祀；下编结合青铜器、考古遗址和传统文献，论述周的起源、周克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演变，以及文学、婚姻、家庭、生计、娱乐、宗教、法律、官僚制度和周的治国理念。已故史学大家许倬云曾给予评价，认为《中国之诞生》“大纲大目都没错，写得很全”。

■文史期刊

再次认识林则徐

《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8月下，半月刊

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关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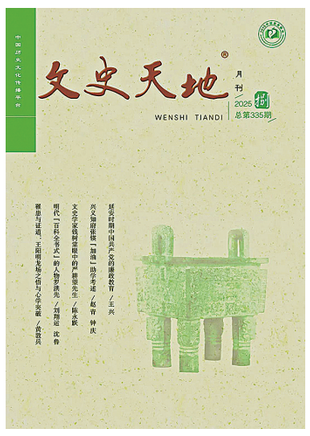
文章从林则徐的名字说起。其中的“林”是指福州著名的“九牧林家”，“则”字是效法之意，“徐”是指以文学才华著称的南朝才子徐陵。徐陵8岁能文，12岁通老庄，博涉史籍；林则徐同样8岁能文，12岁被选为佾生，14岁中秀才，26岁中进士入仕为官。在近四十载宦海沉浮中，他既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经世能臣，亦是直面西方炮舰的民族英雄。他曾赴浙江、河南、江苏等十余省任职，所到之处，关心民生、澄清吏治、兴修水利、赈灾救民、整顿科举、主持盐务改革，被百姓称颂为“林青天”。当鸦片毒雾弥漫神州，林则徐不仅于湖广总督辖境内率先展开禁烟行动，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开始他一生中最光辉的禁烟事业，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探访夷情，林则徐组建翻译团队，选译外国报纸、书籍，撕开封闭帝国的第一道缝隙；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他购置西洋火炮、战船，“师夷长技”，加强军备，整顿海防。中英交战期间，不在前线的他一直密切关注战事，在调度兵力、配备武器、指挥筹划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

在被革职戍守新疆时，他仍在兴修水利、勘查田土，为民造福。自西安出发前往边疆前，心系家国的他写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达其置个人生死祸福于不顾，唯以国家社稷为重的一片赤诚与不朽信念。即便收到再任钦差大臣谕旨，抱恙的他坚持从福州前往广西。临行前，写下旧日诗句交给弟弟林昌彝，仍是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何尝不是他一生最合适的注脚。

开创抗战抒情歌曲先河的汪秋逸

《文史天地》2025年8月号，月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文艺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战”。其中，以音乐为武器的救亡运动是一大亮点。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关注在西南大后方用音乐呐喊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汪秋逸。

文章介绍，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音乐界涌现出两条鲜明的创作脉络：一条是以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雄浑战歌，如惊雷般激荡人心；另一条则是以汪秋逸“江南三曲”为标志的抗战抒情歌曲。

汪秋逸生于江苏扬州，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攻读音乐和美术，毕业后执教于郑州扶轮中学。1938年，日军对郑州进行狂轰滥炸，汪秋逸携家人辗转流亡至贵州，并先后在赤水中学、遵义师范学校任教。目睹山河破碎、民众流离，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救亡运动，在1938年至1940年间创作了代表作“江南三曲”（《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烟雨漫江南》），以柔美旋律抒发炽热的爱国情怀，开创了抗战抒情歌曲的先河。文章写道，汪秋逸对抗战音乐的突破性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将中国古典诗词意境、地域文化意象、抗战时代背景与西方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完美结合，既有婉约之美又不乏慷慨之气，使作品由个人乡愁升华为民族大义，具有极强的艺术性与感染力。

文章这样评价，在贵州这片被乌蒙山脉守护的土地上，这位扬州籍音乐家用江南的柔婉音符与西南的刚健气魄，谱写了一曲曲独特的抗战乐章。他的创作既是对故土沦陷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民族精神的艺术重构，更在贵州的山川之间开创了战时音乐教育的新范式。